

芷兰斋书目著录方式

韦 力

现今论及书目著录方式多指公藏而言,而本文所谈的是当今的私藏,也就是我自己的藏书目的著录方式。历史的原因,今日私藏与公藏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虽如此,于自己而言,仍属敝帚之珍,为了自己使用方便,也编制了目录。

我的编目方式是先有纸本著录,然后再用 EXCEL 表格形式录入电脑,是以四部分类加丛部的五分法,每部分为三级,即部、类、属,表格分为十四栏,现将每栏略述如下:

第一栏是“流水号”。不分善本和普通古籍,按录入的先后顺序自动生成序号,每部书为一个号,不论残、丛,这样可以知道自己录入了多少部书。

第二栏是“部”。分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。

第三栏是“类”。按《四库全书》的分类方式分为四十四类,再参考其它藏书目的分类方式,总计分为六十八类。

第四栏是“属”。是综合各家书目,分为经部八十六属,史部五十一属,史部八十六属,集部四十六属,丛部有类无属。我所参考的书中,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》在分类方式上较为详尽,所以芷兰斋书目基本参考此书。

第五栏是“书名卷数”。著录方式是按照卷首第一行,也有适当变通。例如明万历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《檀弓一卷考工记二卷孟子二卷》,传统的著录方式则为《三经评注五卷》,有许多佛经也是这种情况,有《二论同卷》、《六经同卷》等,书名依此著录,然后再在备注栏中列明细目。若同一部书有不同集者,则一并列出,例如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的《昨非庵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》,其中卷数均用中文,因为卷数应属书名中的一部分,现在有些著录将卷数放在书名号之外,我个人认为不妥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一书中包含着不同作者的文章合刻在一起,遇此情况,我的处理方式是用斜杠将两书名隔开,例如《焦山鼎铭考一卷 / 瘞鹤铭一卷》。

第六栏也是卷数。此处的卷数不同于第五栏之处,是该栏的卷数用阿拉伯数字来著录,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电脑自动统计总卷数,因为中文数字无法用电脑来统计。

第七栏是“作者、作者年代、书的编撰类别”。作者年代加小括号,放在姓名之前,例如明正德本《陶靖节集十卷》,该栏著录为(晋)陶潜撰(明)何孟春注,若撰者与注者为同时代人,则注者姓名前不再标明年代。若是合刻本,则两书的不同作者用斜杠分开,例如《两汉书合刻》作者项著录为(汉)班固撰、(唐)颜师古注/(刘宋)范晔撰(唐)李贤注(梁)刘昭补注。

第八栏为“版本项”。定某书为某版本,是古籍书目中最重要栏目。我主要是以传统书目著录为主要依据,同时参考该书的牌记,以及刊刻者的序跋。若以上均无,则以前序中最晚序言的落款年代为依据,著录为“某某年序刻本”。若此书有批校等附加内容,则在此栏版本后空一格列明某某人或佚名是批、是校、是题记、是跋语或是过录,例如《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别集十卷附录一卷》,版本著录为“清光绪六年常熟归氏刻本 归令瑜录翁同龢临十家批校本”。若该书的版本为丛书零种,则著录为某某丛书本,例如《古列女传七卷续一卷》著录为“明嘉靖三十一年黄鲁曾刻汉唐三传本”。每书的行格也著录在这一栏,我个人的作法是明正德之前的则在版本项列明行格,之后的就不再著录。但如果不能确定该书版本的确切年代,例如有许多书只能笼统地著录为明刻本,遇此种情况,则在该栏内著录行格,以便今后进一步查证和核实该书的具体版本。“重修本”和“递修本”以及“重印本”,也在此栏目中注明。例如《半农先生春秋说十五卷》,版本为“清乾隆十四年吴氏璜川书屋刻嘉庆十五年重印本”。“影刻本”要在版本项内标出该书所影之底本,例如《仪礼疏五十卷》版本为“清道光十年汪氏艺芸书舍覆刻宋景德官本”。用不同材质制版所做出的书,也要在版本项内标明,例如《格致启蒙四卷》“清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木刻与金属版混印本”。除外还有铅排与铜版混印、铅排与珂罗版混印等,此类印刷品我觉得是中西印刷术的一个交汇点的实证物,应当在古籍版本中详细注明,然而我所见到的公私书目均未见有明确著录者。

第九栏是“装帧”。虽然我们习惯性地中国古书统称为线装书,其实线装本是中国古籍众多的装帧形式之一,另外还有卷轴装、包背装、册页装等等。著录装帧不仅仅是为了区分古书装帧形式的异同,同时它也是区分版本的标志。例如清顺治十二年内府刊刻的《御制资政要览》,此书在同一年刻了大小两个不同版式,这在书籍刊刻史上已颇为特殊。不仅如此,该书的大版还分为包背装、蝴蝶装和线装三种装帧,如此作法则更为特别。因为这三种形式并非后人的改装,所以从书籍本身的角度而言,这应属三个不同的版本,若象现在书目著录的那样不标明装帧,则无法将三书分别著录。虽然有些书目著录每书的版框尺寸,然而遇到这种同版印刷的情况,也无法将其分别列明。同时,著录装帧的另一个意义是为了将原装本和后改装本区别开来,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是对原装本较为看重,然而中国古籍善本在对书的外在形式上还远未引起重视。

第十栏是“用纸”。这也是公藏书目未见著录的内容。愚见以为,纸张是鉴

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。因为书籍从物理性来说,绝大多数的书是由纸张和墨组合而成的,判断一部书的年代,若该书的纸张不到年份,那么它上面的附着物,也就是用墨印在上面的字也绝对不会超过该书用纸的誕生日。当然,此点逆定理不能成立,因为可以老纸新刷,例如雍正年间金农用宋代的藏经纸揭裱使用,来印刷《金冬心集》,然而此集绝大多数都是用普通的连史纸和毛边纸刷印的,就今天的市价而言,前者比后者价值高几十倍,因为纸张也是区分同一书印刷多寡的依据,有时同一部书也会用同代的不同的纸来刷印,例如清内府刻的殿版书,大多数用开化纸、太史连纸、连四纸、竹纸等不同印本,乾隆时皇帝曾有明确的上谕:武英殿刷印书开化纸本刷印五部,太史连纸刷二十部,竹纸刷三百部。并且明示开化纸本和太史连纸本用于皇宫内各殿陈设之用,所以这两种纸刷印的书均属陈设本,流传至今者则更为稀见。然现在公藏不著录用纸,则难知所藏该书是陈列本还是普及本。反映到市场上,同一部书用不同纸刷的差价也很大,时至今日,开化纸本根据该书流传的多寡平均每册书在几万元人民币,而同是该书的竹纸本,其价格只有开化纸的十分之一。

第十一栏是“函数”,第十二栏是“册数”。一般而言,公私藏书目大多著录册数而不著录函数。到近些年,有不少公藏书目都按照《中国古籍善本目录》的方式,连册数也不再著录,认为有卷数就可以表明该书的情况。但我认为著录册数和函数还是很有必要的,比如善本标准常提到的三性,其中一条是历史文物性,既然善本也是文物,那么这个文物的数量怎么能不统计出来呢?同样,函数也可看出该书是否是原装,若一部书是原函原装原笈,则其文物性一定会比改装者大得多,在当今的古书市场上原装本与改装本差价也同样很大,所以我认为书目著录应当将册数和函数都分别列明。

第十三栏是“铃章”。一部古书经过辗转流传,上面留下了许多收藏者的印迹,这些印迹是研究该书的递传顺序的重要信息,若不著录铃章,则无法知道该书的流传顺序。另外,铃章的不同,市场的认可度也差异巨大。比如说天禄琳琅旧藏之物,基本都铃有乾隆五玺,此类书在市场上认可度极高,因为有人将其比之为清瓷中的官窑,现在整部的天禄琳琅旧藏的明刻本,其市场价在几百万人民币左右。而若无这些铃章,同一部书的市场的价值仅有该价格的几十分之一。铃章还有一个间接的功能,就是认定批校本上的批校者是谁,从流传至今的典籍上来看,有不少的批校本均无批者落款,有很多批校本的认定是通过铃章来找依据的,因为有些章的章文是“某某手校”等,总之,印章的著录对古籍的研究甚有帮助。

第十四栏是“备注”。此栏在我的书目中是最杂博的栏目,它著录着该书的一些附加信息,大略有如下内容:

1. 牌记。牌记是判断一书版本的最直接证据,比如牌记的落款是“校梓”还是“藏版”,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表明该书是刊刻还是书版转卖而来,所以古书上的牌记需要照录下来。

2. 初印、后印。某一部书的初印本和后印本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区分,在许多情况下,后印本都与初印本在内容上有所差异,所以说印本的先后也是古籍版次的差异。古代书版常常有转卖多家的情况,所以初印本和后印本往往非为一家所刷印。然而历史的原因,很多书的书牌子被撕掉了,在没有书牌子的情况下,著录者往往直接将该书著录为原刻本,能够区分这种情形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列明该书的初印与后印。同时,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市场价值差异也很大。

3. 历史著录。有些善本在递传过程中被前代的藏书家进行了详细的著录,例如《百宋一廛赋》上著录的宋版书,其价值要远远大于寻常所见的宋版;明清的稿抄校本若在大王隆先生的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中能够查到,则其价值倍增。另外,该书若是清代禁毁书,在各种禁毁书目中能够查到,也予以列明。

4. 版画。民国以来,带版画书籍广受重视,近现代书目中大多已将此点列明。带版画之书因为在递传过程中多有损失,同一部书不同的印本则版画幅数不同,所以需标明自藏本的幅数,见到同一版本时,比较该本与自藏本的差异。今年上拍了两部明万历雕虫馆的《元曲选》,完全是同一版本,一部不带版画,成交价是 11.2 万元;另一部带二百幅版画,本月 21 日开拍,起价就是 100 万,从此点可以看出版画在市场上的热捧程度。

5. 避讳。这里谈到的避讳,不是在刊版过程中避皇帝讳,而是书版刻成以后过了若干年再行刷印时,此字又需避讳,翻印者往往将该避讳之字挖改。比如康熙间刊刻的《渔洋山人精华录》,其“禛”字到雍正年间刷印时则剝掉末笔,然从版本著录上仍然是康熙本,在备注中注明“禛”字已缺末笔,表明了与康熙原刻本的区别。

6. 残本卷数。一般情况下,残本的卷数若相连,则直接著录在书名项内,表明为存某某卷,若残本卷数较多,且卷数不连,则列明在备注内。

7. 特殊开本尺寸。现在通用的古籍书目较为详尽者会标明边框尺寸,然而却不标明纸幅尺寸,这样难以知道版框与开本之比。而古代流传的典籍,有些属特制之本,比如国家图书馆展览常常拿出的《梦溪笔谈》,观者都会惊叹如此小的版心与如此大的开本,产生了别样的美感。但是如果查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或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都不能从书目中看出该书是如此的装帧特制本。然此类书籍并非孤证,因此《芷兰斋书目》一般不著录通常的版框和开本尺寸,而将小版心大开本的特制本额外作以说明。

8. 特殊装饰。

①特殊封面。中国的古籍一般封面均为蓝瓷青纸,也有其他颜色的绫或绢,然而天禄琳琅旧藏今日所得见者大多用五色织锦作为每册书的封面,还有些明代的佛经零本是用不同图案的绫面进行装饰,更少见者还有用缂丝作为封面。今日搞传统工艺品研究者对缂丝甚为看重,传此种工艺在清康熙间即已

绝迹。故而此类特殊封面书籍,我均在目录中予以说明。

②特殊别子。线装书一般的书套别子均是用牛骨所制,当然现在大多已与时俱进地改用了特殊化学塑料制品。塑料别子现在很多图书馆均已采用,然此别子容易老化、极易断裂,近年日本已研制出不易断裂的塑料别子,但我认为这毕竟不是正宗的传统方式。虽古籍书套大多用牛骨,然也有特殊者,比如有的用红珊瑚、象牙、白玉、青玉等珍贵材料所制者。一般而言,用贵重材质作装饰物者,其书大多为难得之珍本。

③特殊木匣。古籍中有不少是用木匣作为函套外之装饰,表明原藏家对此书之重视程度。有些木匣是名家所出之物,不但在木匣正面刻有原藏家堂号,有些还会在木匣的侧面留有原藏家墨迹。所以此类木匣亦属于书籍的一个组成部分,从中可窥历史特殊信息,故亦应予以著录。

9. 刻工及钤记。古书中的刻工若同于已有著录者,则在此标明“同《宋元刻工名录》”;若不同者,则逐个列明。另外将写工及监造者亦予列明。有些书籍刻有或钤有该书的成本及售价,此类信息亦胪列于此。

作者系芷兰斋藏书主人